

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 神木县文体局

关键词：陕西 神木 石峁 龙山晚期 夏代

KEYWORDS: Shaanxi Shenmu Shimao Site Late Longshan Age Xia Dynasty

ABSTRACT: In Shimao Site, stone city walls, city gates, watchtowers, corner towers and auxiliary structures similar to “bastions” are found. The city site comprised the “Imperial City Terrace”, the inner city and the outer city, the general area of which would be larger than 400 ha. The eastern gate of the outer city consisting of the inner and outer barbicans, stone-lined rammed earth gate body, the guardhouses, and so on had huge scale, complex structure and advanced construction technique, and yielded jade spade, jade *huang*-semicircular pendant, murals, stone sculptures and potteries and other important artifacts of the late Longshan Age to the Xia Dynasty. Shimao Site is the largest city site of the Longshan Age to the Xia Dynasty in China known to date, which provided brand-new materials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s very meaningful for understanding the pattern of the early civilizations in China under the framework of “ancient culture, ancient city and ancient state” .

一、遗址概况

神木县隶属陕西省榆林市，地处陕西、山西和内蒙古三省区交界地带，西北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接壤，东隔黄河与山西省吕梁山区相望。绝大部分处在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漠过渡地带，地貌以黄土梁峁、剥蚀山丘、沙漠滩地为主。

石峁遗址位于神木县城西南40余公里处的高家堡镇，属黄河一级支流秃尾河流域，河流东西两岸地貌差异明显，西侧沙梁绵延，东部梁峁纵横，秃尾河众多支流即发源于东岸梁峁山地中。石峁遗址在秃尾河及其支流洞川沟交汇处，地表沟壑纵横，支离破碎，海拔在1100~1300米之间（图一）。

石峁遗址因大量流散于海内外一些文

博机构的玉器而闻名。1929年，时任科隆远东美术馆代表的美籍德国人萨尔蒙尼（A. Salmony）在北京征集陕西榆林府农民出售的牙璋等玉器42件，其中最大的一件是长53.4厘米的墨玉质“刀形端刃器”，即经萨氏之手为德国科隆远东美术馆收藏。据称，这批玉器为石峁遗址出土。



图一 遗址位置示意图

1976年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戴应新先生根据神木县高家堡公社提供的线索调查了石峁遗址,并于同年9月进行复查,征集到了一批极具特色的陶器和百余件精美的玉器^[1]。调查者认为采集到的陶器显示出石峁遗址的文化性质和年代与客省庄二期文化关系密切;但其所获玉器年代不甚明确,或为新石器时代遗物,或属殷文化。1988年,他公布了这次调查所获玉器资料,认为石峁玉器和陶器都为龙山时期遗物,石峁遗址是一处规模宏大、遗存丰富的龙山文化遗址^[2]。后来又有更全面详细的报道^[3]。

1981年,西安半坡博物馆对石峁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房址、石棺葬、瓮棺葬、灰坑等遗迹,出土了一些有确切地层关系的遗物^[4]。这是对石峁遗址首次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使人们对石峁遗址的认识有了较为客观的基础,但对玉器年代、文化背景及属性等问题,学者仍然聚讼不休^[5]。1986年4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吕智荣先生对石峁遗址进行了踏查,征集到石器、陶器、玉器等遗物40余件^[6]。此后,陕西省博物馆、省文管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榆林市文管办、神木县文化馆、高家堡文化站等单位多次对遗址进行复查。

2009年10月,罗宏才对石峁遗址展开考察,公布了多达20余件特征明确、造型独特的石雕或石刻人像,均砂岩质地,大部分为头面部像,还有一些半身像或全身像,其中不乏头戴尖帽、高鼻深目者^[7]。

上述工作都说明,石峁遗址系中国北方地区一处极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其数量庞大的玉器、风格独特的陶器及石雕人像等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但关于石峁遗址的规模、年代及文化背景等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有鉴于此,2011年7月至9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石峁遗址进行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2012年,经

国家文物局批准,在复查了前期调查成果的基础上,联合考古队重点发掘了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及城内部分遗迹,取得了重要收获。

二、考古调查

本次调查参照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田野考古操作规程》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法并进行资料记录。调查队员按照南北方向踏查,由持GPS的队员控制前进方向,左右队员间隔10米,以保证调查遍及目标区域。根据不同的地形,调查队灵活选择踏查方法,如在保证队员间距的前提下,将坡地、山峁作为一个独立地理单元集中调查。

作为石峁遗址的主要组成部分,石峁城址是在2011年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工作中发现并首次确认的。2012年,石峁考古队对城圈结构和城垣走向展开了复查,再次确认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3部分构成。其中“皇城台”是四周砌筑层阶状护坡的台城;内城以“皇城台”为中心,沿山势砌筑石墙,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外城则依托内城东南部的墙体修筑一道不规则的弧形石墙,与内城东南墙结合构成相对独立的外城区域(图二)。

“皇城台”是当地人对一处砌石台地的称呼,位于内城中心部位偏西,为四面包砌护坡石墙的台城。它大致呈方形,石墙转角处为圆形,台顶面积8万余平方米。由于破坏严重,部分护墙已难觅踪迹,目前保存最好的石墙位于东北角,有圆形转角,表面可见排列有序的孔洞,内有朽木残迹,总长度约200米,高3~7米。“皇城台”西南角和南侧亦发现一些残存的石砌墙体,南侧墙体还发现横向插入墙体的圆木,保存较好。与内、外两城的石墙构筑方式不同,“皇城台”没有高出地表的墙体,均系塍山砌筑的护坡墙体,护墙自下而上斜收趋势明显,垂直方向上有层阶结构。据悉,20世纪70年代以前,“皇城台”东北侧还可见7级石墙,



图二 石峁城址遗迹分布图

本次调查发现的部分墙体有3~5级结构。

内城将“皇城台”包围其中，依山势而建，形状大致呈东北—西南向的不规则椭圆形。城墙大部分处于山脊上，为高出地面的石砌城墙，现存长度超过5700、宽约2.5米，保存最好的部分高出现今地表1米有余。

外城为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向东南方向扩筑的一道弧形石墙。绝大部分墙体为高出地面的石砌城墙，现存长度约4200、墙宽约2.5米，保存最好的部分高出现今地表1米余。

依据地形差异，石峁城址墙体的建造方法略有区别，包括凿山砌石、基槽垒砌及利用天险等形式。山崖绝壁处多不修建石墙，而利用自然天险；在山崩断崖处则采用凿山形式，下挖形成断面后再垒砌石块；在比较平缓的山坡及台地，多下挖与墙体等宽的基槽后垒砌石块，形成高出地表的石墙。这些石墙均由经过加工的砂岩石块砌筑而成，打

磨平整的石块多被用于砌筑墙体两侧，墙体中的石块多为从砂岩母岩直接剥离，交错平铺并间以草拌泥加固。

本次调查发现了城墙越沟现象，内、外城城墙上均有石墙由沟底攀山坡而上，外城还发现了沟壑底部加宽的石墙。上述迹象首次将石峁城址基本闭合起来，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空间，这也是探讨石峁早期地貌变迁及环境的重要资料。利用Arcgis系统测量及推算面积，石峁城址内城的城内面积约210余万平方米，外城的城内面积约190余万平方米，石峁城址的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另外，“皇城台”和

内、外两城城墙上均发现城门，内、外城城墙上发现了形似墩台的方形石砌建筑，外城城墙上还发现了疑似“马面”、角楼等设施。

调查过程中，采集标本使用了系统抽样和目的抽样两种方法。系统抽样是指在遗址范围内画出同向等距（40米）、直径为3米的圆圈，以其为单位全部采集标本，每个圆圈即为一个采集点。这种做法既能够较好地

了解遗址内遗存的分布状况，还能将圆圈作为一个基本单位，对采集的遗存进行量化统计分析，便于认识相关区域的特征。目的抽样是在遗址范围内有目的地采集有典型特征、能说明遗存年代和文化属性的遗存，比如器物口沿、底部以及纹饰特征明显的标本。

本次调查中，在石砌城墙范围内发现的遗物几乎全部为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的遗存。就其分布密度而言，外城外几乎没有发

现早期陶片；内城与外城间大多数采集点采集的陶片少于12片；内城内采集点采集到的陶片数量为13~31片，部分采集点（集中在“皇城台”附近）则为32~70片，少量采集点可达70片以上。调查也发现了集中分布的居住区7处、陶窑2处、竖穴土坑墓区3处、石棺葬5处和瓮棺葬3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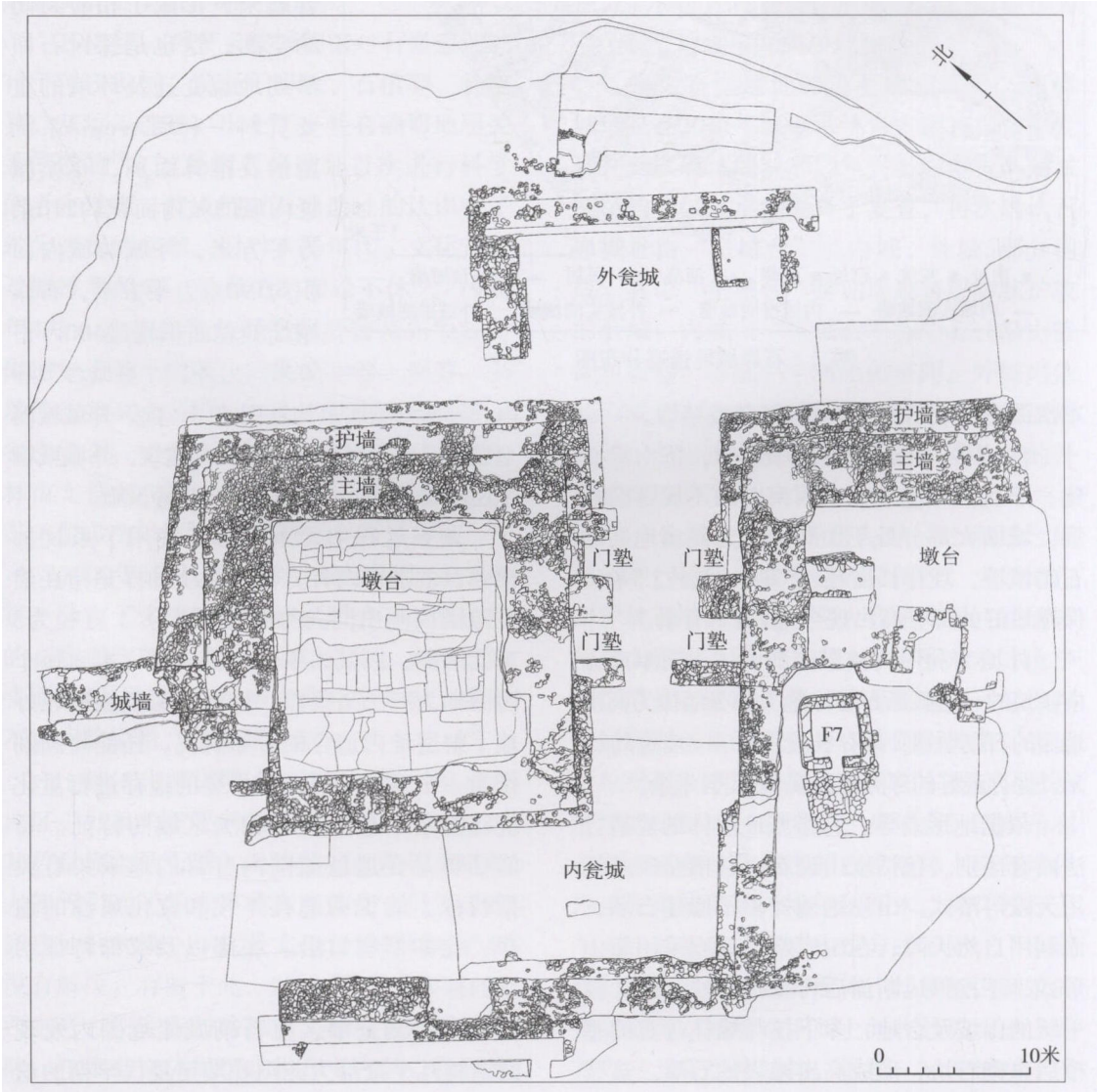
此外，我们对石峁遗址进行了无人机航测，采集了地表三维信息和高分辨率影像信息，并生成了该遗址的DOM正射影像、DEM数字地面模型和DLG线划图等。2011年9月，

我们进一步对石峁遗址的城墙进行了测绘，并引入了国家标准坐标网格。

结合新石器时代晚期内蒙古中南部及陕北地区修建石城的传统，考虑到城墙范围与调查所获龙山晚期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高度一致，我们根据调查成果初步判断：石墙与遗址主体遗存的年代一致，石峁遗址是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之间的超大型中心聚落。

三、考古发掘

2012年5~11月，为解决石峁城址的年



图三 外城东门址平面图



图四 外城东门址（北→南）

代问题，进一步了解其布局及功能分区，我们重点发掘了外城北部的一座城门遗址，依其在整个城址中的相对位置，称之为东门址（图三；图四）。

该门址位于外城东北部，门道东北向，由“外瓮城”、两座包石夯土墩台、曲尺形“内瓮城”和“门塾”等组成。外城东门址位于遗址内最高处，地势开阔，位置险要。门址内各部分以宽约9米的“┐”形门道连接，总面积约2500余平方米。

“外瓮城”平面呈近“U”形，完全遮蔽了门道。其石墙呈“一”型，与两座墩台并未完全连接，南端留有缺口，形成进入城门的通道。南北向石墙长约21、宽2.3米。南、北两端的石墙较短，与南北向石墙垂直，北墙长约8米，南墙损毁，残长约3米，两端石墙均宽约3米。发掘表明，外瓮城石墙经过多次修葺。北端石墙的南北两侧均叠压有晚期的火烧遗迹和活动硬面，北端石墙内侧还发现上层（晚期）的活动面叠压于散乱石块之上，因此推测外瓮城在石墙废

弃之后进行过重建，并在其东南角新建了一处向西的门道，朝向城门的石砌方形房址（F8）。本次发掘所获玉铲和玉璜均出土于外瓮城石墙北端的倒塌墙体和倒塌堆积中，其中2件玉铲出土于北端东西向短墙向北倒塌的墙体内，它们东西间隔约2米，东侧玉铲平置于石块错缝间，石块间还有少许草拌泥（图五至图七）。南端墙体的倒塌堆积中发现了阴刻石雕人头像残块。

夯土墩台以门道为中心对称建于其南、北两侧，形制相似，均为长方形。墩台外以石块包砌，内为夯打密实的夯土，条块清晰、夯层明显、土质坚硬，墩台外包砌一周石墙（暂称“主墙”）。主墙墙体上发现一些排列有序的孔洞，其内有圆形朽木痕迹，这些朽木嵌入石墙内部，周围敷以草拌泥加固。“皇城台”亦见类似插入墙体的圆木，我们初步认为它们当为加固墙体的措施，起到“木骨拉筋”、防止墙体倾斜崩塌的作用，当与《营造法式》中“枉木”的功能相当。南北墩台外侧，即朝向城外的一侧墙体

外围还紧贴主墙增筑了一道石墙（暂名“护墙”），它将墩台东侧墙体以及东部两拐角完全包砌。护墙仅见于靠近城外一侧，所以推测其修筑与增加墩台外侧防护能力、扩展台基上的活动范围有关。墩台外侧靠近护墙的地面有一道与墙体走向一致的长方形砌石，宽约1.2~1.5米，形似“散水”（图八）。

北墩台顶部夯土长约16、宽约14、主



图五 东门址外瓮城北端东侧石墙内玉铲



图六 玉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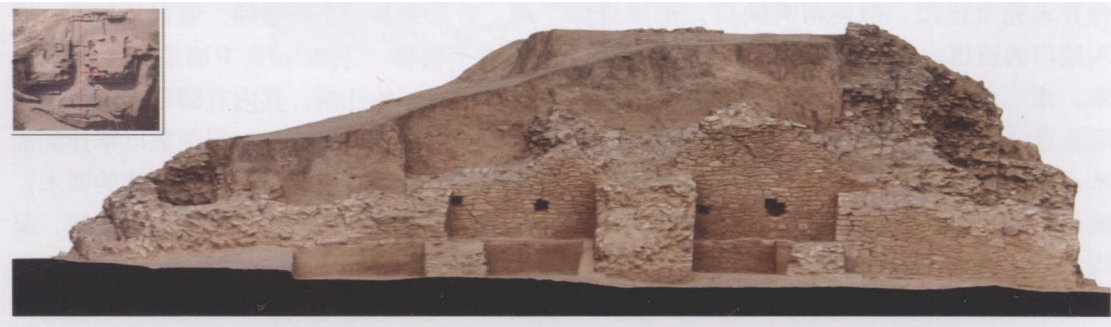


图七 玉铲

墙厚2.7~4.1、护墙厚1.5~2.8米，地面上的铺石“散水”宽1.2~1.5米，墩台最高处距早期（龙山晚期）地面约6.7米。紧贴西侧主墙有一道增修的石墙，宽1.3米，将墩台西南拐角包砌。这道石墙修建于晚期地面之上，为夏时期修葺增补而成（图九）。

南墩台顶部夯土长约17、宽约11米。主墙厚约4.2、护墙厚2~2.5米，铺石“散水”破坏严重，最宽处约1.3米，墩台最高处距早期（龙山晚期）地面约5.6米。夏时期在墩台西侧砌筑了一道护坡短墙，并利用墩台西侧的空间修建了一座类似庭院的独立空间。石砌房址F7为该“庭院”的主体，平面呈方形，门道向西，室外以石板平铺，形成面积大致与室内面积相等的“庭院”。F7室内面积约10平方米、屋墙宽约0.8、残高约0.6米。院落内活动面保存较好，上面还有黑色草木灰和红烧土等烧火遗迹（图一〇）。F7内出土了花边罐、细绳纹高领鬲、大口尊等夏代早期陶器（图一一），院墙倒塌堆积中有1件石雕人面像。需要说明的是，南墩台虽与北墩台对称修建，但目前所见的形制及规模与北墩台略有差异。根据发掘所获地层关系，结合周边遗迹推断，南墩台靠近城内一侧曾经坍塌，发掘所见F7及周边院落应为晚期（夏代）重新修建而成。

南、北墩台中间形成了东门的主门道，宽约9米。朝向门道一侧的主墙上分别砌筑出3道平行的南北向短墙，隔出4间似为“门塾”的空间，南北各2间，两两对称，个别



图八 外城东门址北墩台南壁（南→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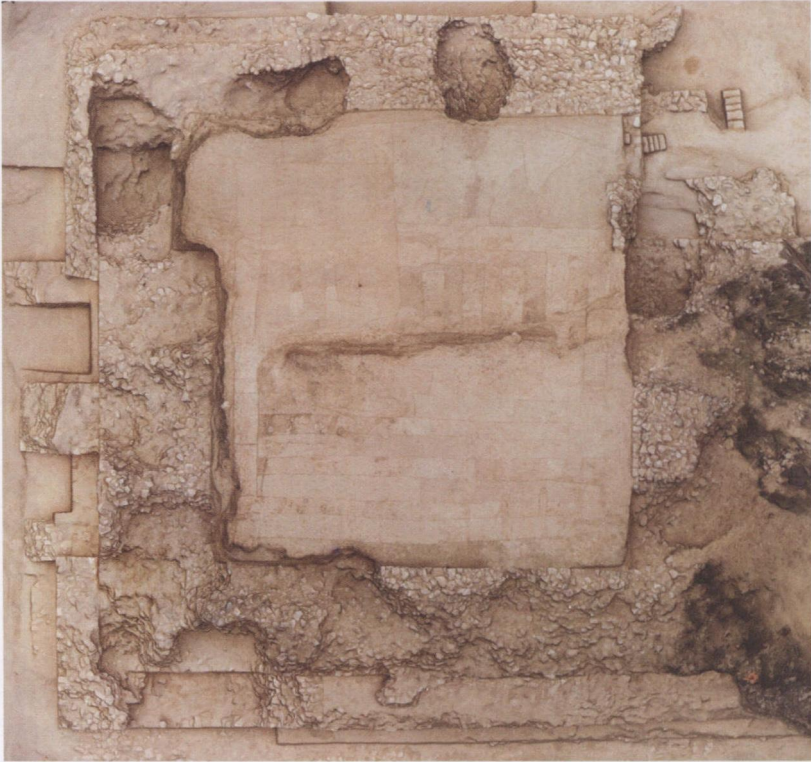
还有灶址。“门塾”地面加工规整、踩踏痕迹明显，早、晚两期地面可与门道对应。进入门道后，南墩台西北的石墙继续延伸，向西砌筑18米后北折32米，在门址内侧形成曲尺形的“内瓮城”结构。石墙墙体宽约2.5

米，保存最好的部分高出早期（龙山晚期）地面4米余。这段墙体在门道内侧增修了一道宽约1.2米的石墙，两墙紧贴并行。结合城址内地层关系，推测这道石墙修建于晚期（夏代）地面之上，应为夏时期修补形成。

此段石墙墙根的地面上发现了成层、成片分布的壁画残块100余块，部分壁画还附着在晚期石墙的墙体上。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色绘出几何形图案，最大的一块面积约0.3米见方（图一二；图一三）。

外城的石砌主体城墙与南北墩台主墙相连，沿墩台所在山脊分别朝东北和西南方向延伸而去，墙体宽约2.5米。

另外，下层地面下发现两处集中埋置人头骨的遗迹（K1、



图九 外城东门址北墩台（东→西）



图一〇 F7（西→东）

K2)。K1位于外瓮城南北向长墙的外侧，略呈椭圆形（图一四）。K2位于门道入口处，靠近北墩台，呈南北向近长方形。两者均

集中埋置了24个头骨，头骨摆放方式似有规律，但无明显挖坑放置的迹象，多数颞骨朝上，还有一些枕骨朝上或颅顶朝上。部分头骨有明显砍斫痕迹，个别枕骨和下颌部位有灼烧迹象。经初步鉴定，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这两处集中发现的头骨可能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或祭祀活动有关（图一五）。

东门址门道内揭露出上、下两层地面。上层地面及其上层堆积内出土遗物较丰富，陶器主要有细绳纹高领鬲、方格纹单把鬲、花边鬲、宽流鬲、篮纹折肩罐等。下层地面多见绳纹和篮纹陶片，数量略少。器形多为鬲和罐。上下两层出土的陶器器形和纹饰差异明显。

发掘表明，东门址门道内上、下层地面叠压关系明确，两层地面间隔一层厚约0.4米的混杂土层。下层地面以下是一层厚约0.3米的黑褐色硬土，东门址的主体建筑及相关设施均修建在该层上，石墙主体基槽亦建在这层土上。因此，该层土为东门址修建时的地基铺垫层，其时代当为石峁东门址的修建时期。

石峁外城东门址上、下两层地面可将城址的年代分为早、晚两个阶段，分别代表了修建及再建两个主要使用时期。上、下两层地面出土的遗物分别属于内蒙古中南部、陕北及晋西北地区常见的龙山晚期和夏时期遗存。因此，石峁城址东门址乃至石峁石城的年代当在龙山晚期至



图一— 大口尊（F7：1）



图一二 出土壁画



图一三 东门址壁画第2层局部（南→北）

夏代早期。

本年度还试掘了内城圆圪旦、后阳湾、呼家洼、对面梁和夜蝙蝠塔等地点，出土了一些龙山中晚期至夏时期的典型陶器（图一六；图一七）。其中后阳湾地点和呼家洼地点发现了房址、窑址、瓮棺葬、石棺墓等遗迹，出土遗存较为丰富。

四、初步认识

通过2011年对石峁遗址开展的系统考古调查及2012年对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的考古发掘，我们确认了一处规模宏大、保存较为完整、基本可以闭合的石砌城址，发现了城门、墩台、角楼、疑似“马面”等附属建筑。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道砌石台基及石墙构成，城内面积在400万平方米以上，城内调查采集遗物的时代不晚于夏时期。

2012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体量巨大、结构复杂、构筑技术先进的石峁城址外城东城门址以及石城墙、墩台、“门塾”、内外“瓮城”等重要遗迹，出土了玉器、壁画及大量龙山晚期至夏时期的陶器、石器、骨器等重要遗物。本次发掘首次从地层关系上确认了石峁城址的修筑年代。结合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我们初步认定石峁城址最早（“皇城台”）当修建于龙山中期或略晚，夏时期毁弃，是我国北方地区的超大型中心聚落。规模宏大的石砌城墙与以往发现的数量庞大的石峁玉器，显示出石峁遗址在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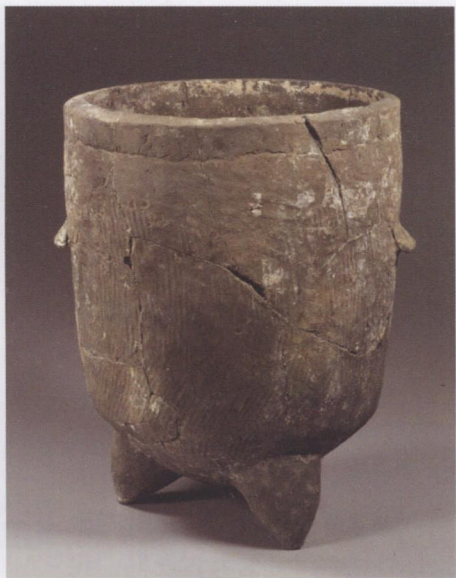
图一四 K1（东→西）



图一五 K2（南→北）



图一六 后阳湾W2出土陶扁



图一七 后阳湾W1出土陶瓮

方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

石峁石城面积在400万平方米以上,规模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陶寺遗址等城址,当是目前所见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它的发掘不仅为研究石峁玉器的年代、文化性质等问题提供了科学背景,亦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资料,对进一步理解“古文化、古城、古国”框架下的中国早期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附记:参加2011年考古调查的有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炜林、杨利平、胡珂、孙周勇,榆林市文物勘探队康宁武、郝志国、周健,神木县文体局项世荣、屈凤鸣、刘小明。参加2012年考古发掘的有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炜林、孙周勇、邵晶、邵安定、马明志、杨利平、郭小宁、白海龙,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队康宁武、周健,神木县文体局项世荣、屈凤鸣、刘小明,西北大学硕士研究生孟庆旭、杨磊等;2012年考古发掘的动物及人骨鉴定分别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胡松梅及西北大学陈靓承担,壁画及麻织物保护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邵安定、路智勇承担。本

项目的顺利实施得到了国家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以及榆林市、神木县及高家堡镇等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执笔者 孙周勇 邵晶 邵安定
康宁武 屈凤鸣 刘小明

注 释

- [1] 戴应新:《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77年第3期。
- [2] 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
- [3] 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一至五、完结篇)》,《故宫文物月刊》第125~130期。
- [4] 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调查试掘简报》,《史前研究》1983年第2期。
- [5] 王炜林、孙周勇:《石峁玉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4期。
- [6] 吕智荣:《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发现细石器》,《文博》1989年第2期。
- [7] 罗宏才:《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石雕像群组的调查与研究》,见《从中亚到长安》,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年。

(责任编辑 付兵兵)

本期要览

江苏泗洪县顺山集新石器时代遗址 顺山集遗址发现了距今8000年的大型环壕聚落以及墓葬、房址、灰坑、灰沟、灶类遗迹和大量红烧土堆积等,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等遗物,该遗址的新石器时期遗存分为三期。这批材料填补了淮河中下游地区该时期环壕聚落考古的空白,为研究淮河中下游地区史前文化谱系和东部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新材料。

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 石峁遗址发现了石砌城墙以及城门、墩台、角楼、“马面”等附属建筑。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系国内已知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时期城址。外城东门址包含内、外两重瓮城、砌石夯土墩台、门塾等,出土了玉器、壁画、石雕和陶器等龙山晚期至夏时期遗物。石峁遗址对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有重要意义。

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 2012年,阿敦乔鲁遗址发掘了3座大型建筑遗迹和9座石板墓。出土了陶器、石器、铜器以及包金铜耳环、石人等遗物。遗址与墓葬的年代集中在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间,属于青铜时代早期。这批材料对揭示西天山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面貌、探索新疆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及与亚欧草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线索。

山东沂水县纪王崮春秋墓 纪王崮春秋墓为带一条墓道的岩坑竖穴木椁墓,由墓室、墓道及附属的车马坑三部分组成。墓室与车马坑共凿建于一个岩坑中。墓室由外椁室、内椁室、二重棺、两个器物箱、三个殉人坑组成。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青铜器等遗物。纪王崮春秋墓规模大、规格高、结构特殊、出土遗物丰富,对研究该地区东周时期文化和丧葬制度等意义重大。

河北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与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 2011~2012年,邺南城郭城区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发现了寺院中轴线北端的大型建筑基址和东南院的中轴线大型建筑基址等。在邺南城郭城区还发掘了一处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的数千佛教造像时代跨越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和唐代。这些考古发现有力地证明了邺城作为6世纪中国北方佛教中心的地位。

贵州遵义市海龙囤遗址 海龙囤是集关堡山城与土司衙署于一身的土司城堡。2012年,这里重点发掘了“新王宫”遗址,并对遗址及周边展开调查,试掘了“老王宫”遗址。“新王宫”是四周有封闭城墙、以中央踏道为中轴线的宏大建筑群,出土了大量建筑构件和碑刻、瓷器等遗物。海龙囤的发掘为从考古学的角度推进土司制度研究、探讨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新材料。